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ink and light color, depicting a misty scene with bare trees and a body of water.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 儒林外史 与中国士文化

(修订版)

---

胡益民 周月亮 /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儒林外史 与中国士文化

（增订版）

陈平原 袁世硕 等著

中华书局出版

# 儒林外史 与中国士文化

(修订版)

胡益民 周月亮 /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胡益民,周月亮著. —2版  
(修订版).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81052-018-0

I. 儒... II. ①胡... ②周... III. ①儒林外史—知  
识分子—研究②科举制度—研究—中国  
IV. I207.419②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501 号

## 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修订版) 胡益民 周月亮 著

---

|      |                        |    |               |
|------|------------------------|----|---------------|
| 出版发行 | 安徽大学出版社                | 照排 | 合肥述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 印刷 |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     |
| 联系电话 | 编辑室 0551-5107719       | 开本 | 850×1168 1/32 |
|      | 发行部 0551-5107784       | 印张 | 10.25         |
| 电子信箱 | ahdxchps@mail.hf.ah.cn | 字数 | 263千          |
| 责任编辑 | 高兴                     | 版次 | 2005年6月第2版    |
| 封面设计 | 孟献辉                    | 印次 |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

---

ISBN 7-81052-018-0/I·2

定价 20.00 元

---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

何满子

已故的吴组缃先生谈小说常常出语惊人，好些突兀精彩的意见可惜没有形之于文字。记得1980年秋，我有一次在他北大寓处同他谈起《儒林外史》，他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与命运，除了反右、文革、上山下乡之外，《儒林外史》里已经全有了。”

这番话，我以后愈想愈觉得意味深长。以往我们研究《儒林外史》，往往只将眼光局限在小说反映时代这一“断代”的框子里，从吴敬梓的艺术和18世纪的现实的关系上观照一切，却疏忽了这一刻画时代的卓越艺术中的历时性，即这部18世纪的艺术社会史的历史的传承性内涵。吴敬梓的艺术感兴大致说来是由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各种色相触发出来的；18世纪的知识分子不是从天而降的，至少还有双倍的18世纪的历史重负压在他们身上。这些历史内涵不能不凝缩而变形地透现在吴敬梓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色相里。不细辨这一历史的传承关系，即无以深入地把握吴敬梓小说里的艺术的现实，也就无以理解小说艺术力

量的历时性。我想,这或许正是鲁迅先生所慨叹的“自从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儒林外史》好像也不伟大了”一语的真正含义。

因为《儒林外史》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和命运的历史积聚的造像,这才能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各种色相的参照系和透视这真实灵魂的历史的镜子。《儒林外史》不仅在当时,人谈之“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评语),今天也还是。

我以前还觉得,吴敬梓把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各种色相都写到了,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写上知识分子卖友求荣、自己整自己同伙的典型事例和典型性格,只在匡超人身上略略给了一点信息。我没有能如吴组缃先生那样睿智地想到那时没有“反右”、“文革”这类刺激着知识分子做出不堪的下作行动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只能在文人相轻和功利小处作点贩卖。

本书是探索中国士文化传统及其文化性格形成史的专著。我与作者胡益民和周月亮二位有过深浅不等的交往,深佩他们的识力,特别是深佩他们的探索路子,正好能补偿以往对《儒林外史》中知识分子性格和命运的历史内涵探索之不足。本书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一般的精神特征入手,是溯远源;继以讨论封建统治者用以牢笼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对文人的影响,是溯近源;再具体分析吴敬梓笔下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由抽象至具体,目的都在解释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一回事。弄清这个历史传承的意义,就不待我来饶舌了。

较之“显学”《红楼梦》研究之繁荣,《儒林外史》的研究显得相当冷落。不过,《儒林外史》也确实更难研究,但绝不是无可研究,至少不比《红楼梦》的研究余地小。之所以说它难研究,是因为,凡研究者自己也都是知识分子,挖下去是要挖到自己的。研究自我向来难于研究身外的客观现象,因而,从宏观说,声光电化的发现可以深广之于无穷,而人学却跨出跬步亦为难,这机制是相同的。

所以,我感佩胡、周二位的努力,并盼望从此更能扩大、深入现有的成果。

1995 年于上海

# 目 录

|        |     |
|--------|-----|
| 序(何满子) | (1) |
|--------|-----|

|         |     |
|---------|-----|
| 第一章 引 论 | (4) |
|---------|-----|

|                          |     |
|--------------------------|-----|
| 一、以《儒林外史》为证据系统研究中国士文化的意义 | (4) |
|--------------------------|-----|

|                    |     |
|--------------------|-----|
| 二、《儒林外史》的形象系及本书的构架 | (9) |
|--------------------|-----|

|       |      |
|-------|------|
| 三、其 他 | (14) |
|-------|------|

|           |      |
|-----------|------|
| 第二章 士—仕通说 | (18) |
|-----------|------|

|                |      |
|----------------|------|
| 一、先哲所悬设的“士”的标准 | (18) |
|----------------|------|

|             |      |
|-------------|------|
| 二、理想的士与实际的士 | (27) |
|-------------|------|

|             |      |
|-------------|------|
| 三、“内转”与“外推” | (49) |
|-------------|------|

|       |      |
|-------|------|
| 四、士与仕 | (54) |
|-------|------|

|          |      |
|----------|------|
| 五、士的“使命” | (64) |
|----------|------|

|          |      |
|----------|------|
| 第三章 士与八股 | (74) |
|----------|------|

|          |      |
|----------|------|
| 一、从科场到官场 | (75) |
|----------|------|

|          |      |
|----------|------|
| 二、八股“选政” | (92) |
|----------|------|

|               |       |
|---------------|-------|
| 三、八股法对士子质量的劣化 | (103) |
|---------------|-------|



---

|                   |       |
|-------------------|-------|
| <b>第四章 “名士”记略</b> | (112) |
| 一、“今不如昔”          | (112) |
| 二、“风流乡愿”          | (114) |
| 三、儒道两脉四流          | (127) |
| 四、“风流侏儒”          | (129) |
| 五、文化的命运           | (142) |
| 六、“沙龙文人”          | (151) |
| <b>第五章 贤人新论</b>   | (159) |
| 一、正儒的士君子理论        | (160) |
| 二、虞博士身后的难题        | (166) |
| 三、庄征君的窘境          | (174) |
| 四、正儒迟衡山           | (180) |
| 五、儒侠萧云仙           | (188) |
| 六、贤人们的“内外交困”及其原因  | (193) |
| <b>第六章 奇人分析</b>   | (200) |
| 一、杜少卿的沉重与悲凉       | (200) |
| 二、围城式古典的现代意识      | (211) |
| 三、沈琼枝并非娜拉         | (217) |
| 四、“出”与“处”的不同结局    | (221) |
| <b>第七章 余 论</b>    | (228) |
| 一、受害与解嘲           | (228) |
| 二、淹滞与媚俗           | (235) |
| 三、“道德老人”          | (239) |
| 四、内桎梏与爱心          | (244) |

---

|                            |       |
|----------------------------|-------|
| 五、反讽：一个主题级的宏观特征 .....      | (247) |
| 附 编 .....                  | (250) |
| 附编一：康雍乾时期小说“反理学倾向”综论 ..... | (250) |
| 附编二、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厘谈 .....     | (299) |
| 引用及参考书目 .....              | (313) |
| 后 记 .....                  | (318) |
| 修订版后记 .....                | (321) |

## 第一章 引 论

### 一、以《儒林外史》为证据系统 研究中国士文化的意义

中国士文化问题近年愈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甚多。特别是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功力深厚,见识卓越,堪称扛鼎之作。然而,学者们似乎忽略了余先生曾经言及而又出于弘道之心不忍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即事实上“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sup>①</sup>。而问题恰恰在于:上自孔子,下至王国维,任何一个“士”无一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因此,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仅取证于经史或诗文集去寻绎“士”的概念,描述其“弘毅”或“志于道”的理想层面,不说片面,起码是不全面的。这也正是本书以《儒林外史》(以下有时

---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简称《外史》)为证据系统探究中国士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品格的缘由。

《儒林外史》通篇写士,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封建末世“士的百科全书”。它的作者——具有强烈历史理性和真正人文关怀的吴敬梓,一位有“志于道”并充满理性精神的士。“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身在天才作家,正是出于对士子命运强烈的忧患意识,才有《外史》之作。他笔下那形形色色的“士”——贤士、奇士、名士、八股士……作为研究中国士文化的“标本”,或许比那“涂抹太厚”(鲁迅语)的经史上记载的数不清的理想型的士要可靠得多,也血肉丰满得多。以这样一部就总体而言通篇以士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来讨论士的衍变、流品与文化性格,在方法上大致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除了全书以士子生活为题材这个显见的事实而外,尤可提及的是:

第一,吴敬梓的出现,意味着文化人作为真正的叙事人(而不是代言人)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外史》是地道的有极高文言修养的文人写的白话而非已有平话之整理本,也就是说,它是真正的士子写士子的小说。

第二,《外史》的取境与立意不再跟着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或民间市井心理走了。它的出现是士人觉醒这个历史进程孕育出来的。我们只要稍做一下比较便一清二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史诗性作品,却称不上是严格的个人的心灵之作,它们是集体合作,一人或数人

定稿，多是平话整理本（只是加工程度不同而已）。这便天然地使它们带有媚俗性。《三国演义》中的士子问题倒很突出，写尽了文士、武士争取权利与荣誉的机遇和命运，然而其基本问题是士人如何与军阀相结合的问题：能够“遇明主”，充分地为其所用便是成功，否则便是失败；它也写到士林中的败类如何只问利害不问是非，从而成为反复无常、卑鄙无耻的小人。价值坐标很简单：无非“忠、义”二字。《水浒传》中也有士子问题，只是他们如何与草莽英雄相结合而已。《西游记》中的唐僧倒是个略略近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可惜他尽管有高尚的终极关怀，且九死不悔，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取经路上只是孙悟空的累赘。上述作品的写定者虽然也是读书人，但由于他们接受了主流的流行话语的传统，因而并没有写出士子的“切身处境”与“实际问题”。显然，从根本上说，它们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小说”。若依据它们来做研究知识分子的证据，还必须首先研究作品本身的形成过程。

依据吴敬梓的《外史》，情形则大为不同。因为《外史》不再是歌颂忠义或煽动才子佳人密约偷期，它是追问的，它要追问功名富贵的依据，追问人怎样生、路怎样行的依据。

中国小说家中如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追问式小说家”<sup>①</sup>，吴敬梓是第一人。官方一直有意而且有效地用来诱惑、收拾士人的科举制度、文字狱和司法制度以及势利风习等等，都无不受到了作者从容不迫、透骨入髓的批评和拷问。在中国传统小说中，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富有《外史》这样的人性尊严、明白的理性和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深刻思考。

以往所有的关于《外史》是现实主义杰作的评论，实际上都可以成为这个“证词”资格最合格的旁证：它尽管是小说，却具有“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斯多德语）那种意义上

① 关于追问式或曰拷问式小说家，这里是沿用鲁迅先生《〈穷人〉小引》的界定：“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言、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最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到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见《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03、104、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的真实性。我们要讨论的是：仅依据经史上记载的那数不清的理想的士以及依照儒家的士君子观念为证据体系的研究，描述的其实只是“士”这个类的最上限的精神世界，而吴敬梓所关注、所烛照的则是“士”这个类的实存状态，是占大多数者普遍的境遇与心态，也差不多是这个群体的下限状态。就抽样的涵盖面而言，《外史》显然就合格、典型得多。因为圣贤几稀，文雄亦是屈指可数；相对于浮出了水面的冰山尖来说，水面下的那个十之八九不更是不可忽视的实体所在，不更有个案研究的价值么？

进而言之，《外史》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当代文学”，而非明朝人写三国的英雄、唐朝的和尚或宋代的山大王，这不但容易在细节上真切起来，更容易准确地传达出“当下此在”的情绪。而这就从实和虚的两个层面大大提高了“证词”的力度。而且，众所周知，《外史》的主要人物差不多都是有原型的，《外史》的讽刺手法其实就是还原写实法（参见何泽翰《〈儒林外史〉本事考》）。人们所称道的《外史》的“自然讽刺”，其魅力和力度就在于因写实而真实。

当然，换个角度看，《外史》毕竟是小说，其论据作用毕竟也是有限度的，它是所谓“影子的影子”。这样，我们就既需要从影子追索原型，同时又需要深入地解读影子里所包含的“问题情境”。概括言之，我们的士文化研究最终的落脚点是古代士子的人生境况和精神状态。

凡是已成为经典性的伟大作品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达到了对其叙述的那种生活的本体象征的高度，《红楼梦》

如此,《儒林外史》亦然。《外史》作为一流文学经典,当之无愧,其中的故事自 19 世纪以来早已被人当成信而可征的“掌故”来使用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特别看重《外史》对士子的追问式取向,与所谓“儒林群丑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外史》到底是“丑史”还是“痛史”,本书不拟讨论。确切地说,一部《外史》正是一部士子漂泊的悲歌。吴敬梓着力写的是士子的“误解与失败”,以及哭笑不得的尴尬,是并非一个“痛”字或“丑”字可以概括的。

## 二、《儒林外史》的形象 系及本书的构架

所谓“文化”,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他的“态度”。用荣格的话说,“一切文化全部运作的最终体现是人格”。吴敬梓的描述视角盯在了士人的“态度”上,我们的研究视角也同样是盯在“态度”上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世界观,人物的言语品质最能体现他的文化品格。《外史》的主要叙述方式就是“客厅谈话式”(这一点曾朴早就指出过)。就像《围城》中的孙柔嘉用画红指甲的办法传神地为汪太太做的“提要”一样,吴敬梓透骨入髓地用“提要”法写出了书中人物的种种“聚谈”。如同《三国演义》中的人总在打仗、《水浒传》中的人总在杀人越货一样,《外史》中的人只是在彼此聚谈。此起彼伏的“聚谈”勾勒出一个可



称之为“精神遭遇”的大故事，而支撑这个故事的基本冲突是文化记忆与文化现状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使士子群体分裂为四种类型：八股士、假名士、贤人、奇人。

八股士、假名士以及全民皆般地趋炎附势的势利见识，在新闻媒体还靠口耳相传构成声气的古代社会，这三类流行色构成了令作者痛心疾首的文化现状。所谓“文化记忆”，则是指所谓“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那种士人理想的追忆。之所以说是记忆、是追忆，就是因为作者环顾神州士林，足以当之者：“到处讲究的是揣摩逢迎的考校、升迁调降的官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纱帽之天下！八股文化之大昌于天下，即因为纱帽召唤着那些八股士们。他们舍生忘死地竞相奔走在这一条钦定的“康庄大道”上，竟相比赛“揣摩”的功夫。作者认为当时的八股士是被八股吸魂器吸干了气血的空心人，如周进、范进；而所谓假名士，则是玩感觉的闲人。他们都是原始儒学教旨的叛徒<sup>①</sup>，是文化现状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然而由于这两派读书人成了在朝在野的最大群体，真正的文化传统在被大面积地遗忘，原始儒学教旨遭到了彻底的扭曲，“代圣贤立言”的科举考试已变成了即使圣贤本人复生也考不上的选拔“贤才”的考试。故而真正秉持着原始儒家教旨的贤人（如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以及以强硬的个人主义姿态坚持原始儒家精神的奇人（杜少卿等），不是被目为呆便是被指为狂，他们

---

① 关于原始儒学问题，参看拙文《〈女仙〉〈儒林〉合说》，《儒林外史学刊》第一辑，黄山书社，1988。